

# 转型中国的国家认同变迁趋势研究\*

徐延辉 赖东鹏

**提要:**国家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基础,对加强民族团结和增强国家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观测到一定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特征。研究发现:第一,个体的国家认同随年龄增长呈现逐渐上升的变迁趋势;第二,国家认同在1995—2018年呈“V”型变动趋势,其中1995—2007年呈下降趋势,2008—2018年呈上升趋势;第三,不同世代的成长环境对个体的国家认同构建具有深远影响,改革开放后出生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以上发现对理解转型社会的国家认同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家认同 社会转型 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

## 一、研究背景

国家认同是一国政府合法性的社会基础,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的心理支持和情感偏好对加强社会团结与提升政府效能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在塑造集体意识与增进社会凝聚方面居于核心地位。从微观层面看,国家认同满足了个体在多元情境中重寻本体性安全的需要,积极的国家认同有利于构建均等和共同的价值理念,产生正向效益(Akerlof & Kranton, 2000)。从宏观层面看,国家认同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消解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国家整合(亨廷顿,2005)。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和多元文化的兴起,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社会空间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抽空了国家认同所倚赖的参照群体(李友梅等,2007:9)。随着现代化和个体化进程不断加剧,国家认同

---

\*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141)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不断式微,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亨廷顿,2005)。纵观历史,中国的国家认同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在古代中国,国家认同仅仅表现为一种大一统的天下观或正统王朝观念(李大龙,2007),即一种社会成员对在位君主和所属王朝的归属和忠诚(姚大力,2018:18),并未形成清晰明确的国家认同感(梁启超,2001:661)。随着王朝的不断更替,近代中国逐渐出现了一个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意识。特别是在西方列强的外部冲击下,国家认同转变为一种国家民族主义。随着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李大龙,2020),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表现为一种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全体国民的认同意识(姚大力,2018:20)。国家是一个共同体能够借以产生共同意志和共同行动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民众观念中,国家是扩大了的家庭,国家认同是扩展和深化了的家族认同,中国民众家国同构和修身齐家治国相通的社会观强化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国家认同感(韩震,2010)。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民众的国家认同带来了一定挑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建立起一个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的“总体性社会”(孙立平等,1994;李友梅等,2008:59),社会整体呈现高度统一和一元化等特征。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是以突出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王雅林,1994),市场化和现代化等多条路径被压缩到同一历史阶段中(李友梅、贾文娟,2018:2);另一方面,伴随着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郑功成,2017),由此导致不同社会群体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目标的认知和期待趋于“碎片化”(李友梅等,2007:168)。在此背景下,深入剖析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探讨提高民众国家认同的有效对策,成为学界亟须回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相比于对单个时点的横截面数据分析,趋势分析提供了动态研究视角,有助于从宏观角度认识社会现象的变迁规律。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对中国民众国家认同变迁趋势的关注略显不足。

社会学领域的变迁研究主要关注三种时间趋势,分别为年龄、时期与世代效应。具体而言,年龄效应假定微观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政治态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时期效应假定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范围内,身处其中的所有个体的政治态度都会受到当时的制度、政策、社会事件等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世代效应假定同一历史时期出生的群体可能具有相近的政治态度,这是由其成长过程中的共同社会经历及其产生的集体记忆所致(Ryder,1965)。本文据此将国家认同的变迁置于年龄—时期—世代的趋势分析框架中进行考察,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

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采用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模型(Age-Period-Cohort Effect Analysis,简称APC),将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进行分离,探索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

##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构建

### (一) 国家认同变迁的理论框架

#### 1. 国家认同及其研究进路

“认同”概念涉及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是对“我们”是谁和“他们”是谁的反思性理解(周晓虹,2008; Jenkins,2008:18)。哲学和心理学将认同界定为“同一性”(sameness),指涉某一类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认知(recognition),包括其内部统一性(unity)中所具有的内在变化和其他多样性(Baldwin,1911:504)。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认同涉及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的界定和划分。社会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的社会比较之上,认同是个体将内群体身份内化为自我概念的社会过程,表现为个体基于社会分类确认归属群体的主体意识(Tajfel & Turner,1986:16)。

关于身份认同形成的研究范式,影响较为深远的有“原生论”和“建构论”两大模式(李斌、张贵生,2019)。原生论将身份认同视为个体与生俱来的本体性意识,认为它由血缘、语言、习俗、宗教等与亲属传承相关的因素所决定(Turner & Coyle,2000)。个体的认同与其亲属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血缘和亲缘关系在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Horowitz,1985:56-57)。建构论强调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不仅受文化影响,还取决于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建构性(Jenkins,2008)。这意味着个体的身份认同不是先验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并通过群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互动逐渐建构起来的(Barth,1969:9-11)。费孝通指出,“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不会自觉地认同。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费孝通,1989:7)。从建构论出发,自我认同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概念,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属性,身份认同的形成受到结构性力量和主体性行动等多方面的影响。从时空变迁角度来看,认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人们的认同和归属感经由历史和文化遗产而不断发生变化。身份

认同具有多重属性,比如人首先拥有的是以血缘族群为代表的自然属性。然而,人的社会性决定了自然属性永远与社会属性相关联(韩震,2010),因此,以血缘为基础的原生族群认同与社会化后建构起来的身份认同密不可分。

国家认同是一种集体性身份认同,一种社会成员主观或内化的、属于某个国家的感受(Huddy & Khatib,2007)。国家认同的具体内涵可以概化为内生的身份感(或归属感)和外生的荣誉感(或责任感)(Pollmann,2008;李春玲、刘森林,2018)。国家认同包含国家依恋感(national attachment)、国家沙文主义(national chauvinism)、国家自豪感(national pride)以及个体对国家认同的规范性认知(the normative concep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Gustavsson & Stendahl,2020)。其中,国家自豪感是国家认同最自然的情感表现和最重要的测量指标,它既体现了个体对自己所在国家取得成就的自尊感或自豪感,又反映出个体从自己的国民身份中所获得的自尊感或自豪感(Smith & Kim,2006)。

国家认同的特性决定了其通常并非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而是存在形成、维持和变化等动态过程,宏观结构因素和微观个体因素都会影响国家认同的变化趋势。前者包括全球化、现代化、社会发展、政府效能、法律体系和舆论宣传等(Kunovich,2009;Davidov,2011),后者包括个体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社会阶层和主观的歧视知觉、融入感知、威胁感知等(Jasinskaja-Lahti et al.,2009;Wright,2011;李春玲、刘森林,2018)。

依循身份认同的研究进路,国家认同的研究范式可以分为原生论和建构论两类,国家认同也可以概括为文化性国家认同和政治性国家认同两大类型(马得勇,2012;Tamir,2019)。文化性国家认同又称为族群性(ethnic)国家认同,具有先赋性特征,这与身份认同的原生论紧密相关。文化性国家认同以历史主义范式为基础,认为国家认同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深刻根植于一国民众共同的祖源叙事、先辈记忆、方言民俗和家园历史(Jones & Smith,2001),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接纳程度。政治性国家认同依循建构论的分析进路,认为个体的政治态度更多是后天习得和外部环境塑造的。尽管人们出生时的文化传统赋予其原生身份,但是宏观的社会发展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可能会改变其政治态度。政治体系获取认同的最有效方式是国家通过政治社会化使社会成员对政治体制和执政政府发展出积极的心理取向,国家认同源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及政府的执政理念对民众的潜在吸引力(马得勇、陆屹洲,2018),表现为民众对于国家的主权、结构、法律和政府绩效等方面的主观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爱国意识和国家自豪感等(Ignatieff,1993)。国家认同不仅仅是个

体内在的心理过程和民族文化历史的自然反映,更取决于个体对特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和理性选择(North,1990)。

在现代社会,国家功能不仅包含传统上的政治功能,而且增加和拓展了社会民生保障功能。为公民提供教育、养老、医疗卫生、交通、治安、法律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国家绩效合法性(legitimacy)的重要来源和国家权力的法理基础(赵鼎新,2016),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民众的政治认知模式、政治行为特征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能够对国家认同产生内生性的激发效应。国家必须提供基础的福利保障,创造条件让国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民众才能从内心形成共同体意识(陈劲松,2009;杨渊浩,2022)。国家认同的变化与个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国家认同感的高低是个体自我成长和国家共同体构建双向互动的结果(王卓君、何华玲,2013)。从政治支持论(political support)角度来看,任何政治体系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民众对政治共同体(community)、政治制度(regime)与权威当局(authority)一定程度的支持。这种政治支持既包括投票、游行等显性的支持行为,也包括信心、偏好和认同等隐性的支持态度(郑振清等,2018)。已有研究表明,政治支持与社会成员从执政者的政治绩效中获得特定利益而形成的满足感有关(Easton,1975),国家的存续和发展有赖于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绩效的认同。鉴于此,本文将政治性国家认同作为研究重点,探讨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特征及其变迁趋势。

## 2. 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变迁的分析框架

政治支持与国家认同密切相关,而政治绩效又可能对政治支持产生影响。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合法性奠基于政治绩效合法性之上(Zhao,2009),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一国的制度框架能否赢得民众的广泛认可,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能否高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并取得卓越的治理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居民收入与经济总量基本同步增长,收入结构不断改善,经济绩效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陈捷,2011)。已有研究表明,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政治支持和国家认同水平相对较高(李春玲、刘森林,2018;郑振清等,2018)。然而,绩效合法性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一旦执政者的承诺不能兑现,就可能出现不稳定性和政治危机(Zhao,2009),比如有的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政治支持容易受政府绩效和地方政策的影响而产生波动(陈捷,2011:53)。虽然经济增长始终是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但是民生福利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进而会成为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孟天广、杨明,201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在政治实践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民心政治”的执政模式(刘伟、肖舒婷,2023),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就业、社会保障、卫生与健康、教育、住房、养老等各类社会政策实践体系(关信平,2022),其中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也是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2022:46)。人民在何种程度上认同其生活的国家,自觉履行国民义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如何对待人民和造福人民(殷冬水、范京京,2021)。“民生政治”是中国政府基于中国国情探索出的发展范式,其特征在于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奋斗愿景(杨渊浩,2022)。共同富裕是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其本质是通过矫正、补偿和降低某些因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等,为全体人民创造均等参与高质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郁建兴、任杰,2021)。社会政策对社会团结的工具性作用首先体现在对社会平等的促进上(房莉杰,2019)。因此,关注民生政策变化及其对社会平等的影响,对考察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十分重要。

上述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提供了重要指导。然而,现有研究更多是从理论层面或静态视角对国家认同进行探讨,缺乏基于纵贯数据的动态趋势研究。本研究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全国调查数据,运用年龄一时期一世代效应分析模型,聚焦分析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

## (二)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

### 1. 年龄效应

年龄效应主要反映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随着个体的年龄增长而发生的变迁趋势。人们在不同的生命发展阶段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角色与地位的转变伴随着社会期待的转变,带来观念上的演变(Alwin et al.,1991)。据此推测,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可能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政治学领域的生命周期效应假设(life-cycle effects hypothesis)为国家认同变迁的年龄效应提供了可能的理论依据(Neundorf & Niemi,2014)。

生命周期效应假设指出,个体的政治态度会随着生命的不同阶段而变化,这意味着年轻群体和年长群体的政治态度可能存在较大分歧(Dalton & Shin,2014);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会逐渐形成完整的人格,其政治观念会逐渐趋于稳定(Meeus et al.,2010)。具体来说,年长群体更偏好稳定和谐的

政治生态 (Meier et al., 2019), 更可能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 对共同体具有更高的认同感。例如, 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并在中年时期处于较高水平 (Clark & Eisenstein, 2013)。与之相对, 年轻群体的政治观念更可能呈现极化状态, 更可能对非制度性和去中心化的政治参与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 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感更低 (Henn & Foard, 2012)。

在个体层面, 国家认同的生成和发展体现为社会成员从个体差异走向集体同一的演变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 个体逐渐将自我的社会属性和政治意识嵌入到抽象的国家成员关系当中, 在社会化和政治化过程中完成国家认同的形塑。有研究认为, 当代中国大部分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感比较强 (杨慧青、彭国胜, 2023)。然而也有研究认为, 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仍然处于形成期, 容易受到社会转型中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而年长群体更可能处于优势和稳定的社会阶层位置, 其国家认同感可能相对更强 (李春玲、刘森林, 2018)。

## 2. 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

时期效应通常由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而产生, 这些外生力量通常由某个时期的瞬时作用所引起, 包括特殊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制度环境的改变, 这些变化将对同一时期所有年龄段的人群产生影响 (李婷, 2018)。世代效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同一时间出生的群体上, 同一世代的群体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将在其身上产生相同的烙印, 伴随其生命历程的发展, 以缓慢累积或延迟发生的方式对其产生重要影响 (Elder, 1999)。

作为解释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下降的重要路径 (李艳霞, 2017; 李春玲、刘森林, 2018),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认为, 在工业化时期, 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产生了边际效用递减效应, 公众对于政治体制多元的期望和纵深的的需求导致其爱国热情逐渐减弱 (英格尔哈特, 2013: 31), 政治认同出现代际弱化趋势。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社会推向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 (李春玲, 2015), 因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对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变化可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李春玲、刘森林, 2018)。已有研究尽管从文化视角出发得到了一定结论, 但较少从社会民生和共同富裕视角探讨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模式。

自 1949 年以来,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共产主义理想主导的意义系统的支持下, 中国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 构造出一套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和集体主义工作与生活伦理, 高度重视阶级背景的一致性和思想意识的纯洁性, 将个体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标准化, 使民

众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高度统一和空前团结。依托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套平均主义的再分配模式(郑秉文,2021),通过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保障民众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将民生保障体系融入到社会结构之中。尽管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但这种模式以国家为责任主体、以公有单位为城镇供给保障、以集体经济为农村供给保障,具有低水平、广覆盖的鲜明特征(彭华民、齐麟,2011),有效地解决了新中国早期贫困、卫生、灾难救济和失业等民生问题(席恒等,2021;关信平,2022),极大地提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抗风险能力,对建国初期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国家通过政治整合建立起一个“总体性社会”,在单位制、人民公社制和户籍制等较为完善的社会管理制度框架下,中国政府为社会成员营造了大体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形成了一个短期的“平等化效应”(孙立平,2002:18),社会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

1978年以来,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变化,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绝大多数群体都能摆脱贫困,从市场化改革中受益(李路路,201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也有效提升了社会整体的保障和福利水平。然而,改革开放后,以高度政治整合为目标的传统意识形态逐渐弱化,以个体性和自主性为特征的现代意识形态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社会政策的体制基础(关信平,2022),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社会政策的再分配特质被弱化。特别是1990年以来,市场经济改革的副产品突出表现为群体分化和市场机制对公共领域的侵蚀(王绍光,2008)。在此阶段,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群体之间急剧分化成为突出问题。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人力资本和政治地位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转化为经济利益,加剧了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干群之间的社会区隔和利益分化(李友梅、贾文娟,2018),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效应,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李明等,2010)。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33上升到1994年的0.434(李强,2008:26),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成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市场化机制在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陈光金,2010)。另一方面,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逐渐成为整合社会生活的重要机制,公共服务领域的商品化意味着市场在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社会



政策的运行机制从改革初期的纯福利模式向福利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转型,社会福利模式从普惠性模式向选择性模式转变,其结果在客观层面是加剧了社会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关信平,2022),在主观层面表现为基层民众和利益受损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凸显(梁波,2018:31),导致部分民众的社会心态逐渐失衡(严飞,2021),对公平正义的呼声不断高涨。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外部环境的变迁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显著,如何凝聚改革共识的问题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面对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大幅度上升,中国政府开启了一系列“保护性反向运动”(王绍光,2008),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通过实施一系列反贫困措施和区域与乡村发展战略,调节再分配,协调城乡关系,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新的改革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复强调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以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郑功成,2017;关信平,2022)。随着精准扶贫和民生保障兜底实践的成功,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中国已然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数最多、收支规模位居全球第二的社会保障制度(郑秉文,2021)。随着发展理念及发展模式的转变,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中国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去商品化”和缩小社会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具体研究问题。

第一,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年龄趋势特征是怎样的?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逐渐上升的变迁趋势?

第二,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时期趋势特征是怎样的?是否会随着收入不平等而变化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

第三,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世代趋势有何特征,哪些世代的国家认同相对更高?

###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

WVS)。由于WVS数据时期跨度较长,我们使用该数据进行主要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CSS)进行稳健性检验。WVS开始于1981年,每4~6年开展一次,截至目前,WVS在中国开展并公布了六轮调查数据,调查时点分别为1990年、1995年、2001年、2007年、2013年和2018年。由于1990年存在关键信息(教育、收入等)缺失,本研究只选取了第二轮(1995年)、第三轮(2001年)、第四轮(2007年)、第五轮(2013年)和第六轮(2018年)的调查数据。参照已有研究(Luo & Hodges,2022),我们选取了20~64岁的样本,经过变量筛选和缺失值处理,得到有效样本7506人。CSS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大型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所选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目前只有2013年、2015年、2017年、2019年和2021年的CSS数据涵盖国家认同的测量题项,我们选取这五期的数据,经过与WVS相同的变量处理,得到有效样本36826人。

## (二) 实证策略

依据已有研究对APC模型的总结(Yang & Land,2013),我们将国家认同的APC模型表达为如下方程式:

$$Y_{Ni} = \alpha + \gamma_i \cdot Age + \delta_j \cdot Period + \beta_k \cdot Cohort + \varepsilon$$

其中, $Y_{Ni}$ 表示个体的国家认同水平, $\gamma$ 表示年龄的系数, $\delta$ 表示时期的系数, $\beta$ 表示世代的系数。由于年龄、时期和世代之间存在共线性识别问题,无法求得参数唯一解。杨洋(Yang Yang)等学者提出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Age-Period-Cohort Analysis-Cross Classified Random Effect Model,简称HAPC法),将年龄、时期与世代分置于不同层次,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共线性问题(Yang & Land,2013)。本文使用HAPC法作为主要的分析策略。

## (三) 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国家认同。参照已有研究(Smith & Kim,2006;马得勇,2012),本文将国家认同操作化为“国家自豪感”。在WVS问卷中的具体题项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您在多大程度上感到骄傲?”。选项从低到高分为“根本不骄傲”“不太骄傲”“骄傲”和“非常骄傲”,我们分别将其赋值为1~4分。在CSS问卷中的具体题项为:“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选项从低到高分为“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比较符合”和“很符合”,我们分别将其赋值

为 1~4 分。

本文关注的时间趋势变量是年龄、时期和世代。在 WVS 数据中,年龄变量为被访者年龄。时期变量由五期调查数据收集年份构成,包括 1995 年、2001 年、2007 年、2013 年与 2018 年。世代变量以 5 年为一组,从 1930 年世代组(1930—1934 年出生)一直到 1995 年世代组(1995—1999 年出生),共计 14 个世代组。在 CSS 数据中,年龄变量为被访者年龄。时期变量由五期调查数据收集年份构成,包括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与 2021 年。世代变量以 2 年为一组,从 1948 年世代组(1948—1949 年出生)一直到 1998 年世代组(1998—1999 年出生),共计 26 个世代组。

此外,本文还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1 = “小学及以下”, 2 = “中学”, 3 = “大学及以上”),性别(0 = “女性”, 1 = “男性”),婚姻状况(0 = “未处于婚姻状态”, 1 = “在婚或同居”),家庭年收入水平(1 = “低收入水平”, 10 = “高收入水平”)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1 = “低社会阶层”, 5 = “高社会阶层”)。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Panel 1 WVS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因变量</b>				
国家认同	3.19	0.69	1	4
<b>APC 变量</b>				
年龄	41.36	11.98	20	64
时期	-	-	1995	2018
世代	-	-	1931	1998
<b>控制变量</b>				
受教育程度	1.75	0.73	1	3
性别	0.48	0.50	0	1
婚姻状况	0.86	0.35	0	1
家庭年收入水平	4.51	1.97	1	10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2.39	0.88	1	5
样本量	7506			
Panel 2 CSS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因变量</b>				
国家认同	3.44	0.68	1	4

续表 1

Panel 2 CSS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PC 变量				
年龄	44.68	12.14	20	64
时期	-	-	2013	2021
世代	-	-	1949	1999
控制变量				
受教育程度	1.85	0.68	1	3
性别	0.44	0.50	0	1
婚姻状况	0.85	0.36	0	1
家庭年收入水平	5.40	2.91	1	10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2.23	0.91	1	5
样本量	36826			

## 四、研究发现

### (一) 国家认同变迁的描述性分析

将 WVS 的多期数据合并后,我们首先对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状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有如下发现。

一方面,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选择“非常骄傲”和“骄傲”的民众比例比较高。我们进一步将“非常骄傲”和“骄傲”赋值为 1,视为“高国家认同”,将“不太骄傲”和“根本不骄傲”赋值为 0,视为“低国家认同”。研究发现,在每个调查年份中,具有“高国家认同”的中国民众占比均超过八成。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又呈现一定的变迁趋势。将每个调查年份“高国家认同”的占比情况绘制成条状图可以发现中国民众的“高国家认同”占比从 1995 年的 87.60% 变成到 2001 年的 82.26%,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2001 年到 2007 年呈现缓慢的下降趋势,并于 2007 年达到谷底,占比降至 80.27%。此后,“高国家认同”的占比开始上升并于 2018 年达到峰值(92.63%)(见图 1)。

### (二) 国家认同的年龄效应

为精确刻画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我们建立了国家认同的 APC 模型。具体模型包括仅纳入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变量的空模型和纳入控制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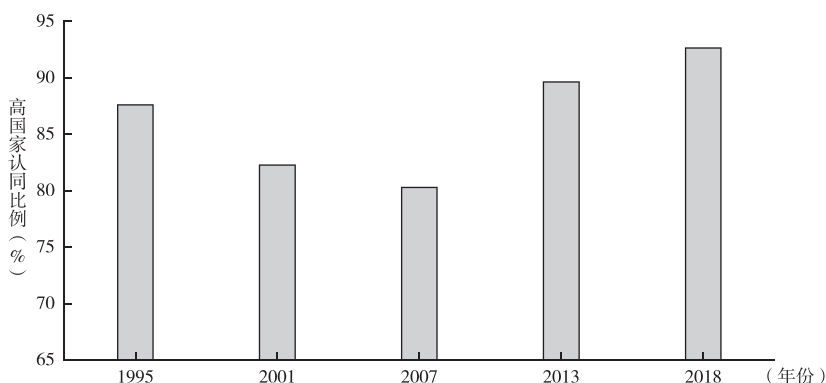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认同变迁的描述性分析:WVS 数据

的全模型。本文使用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APC 估计,具体的结果如表 2 所示。为了更加直接地观察变迁趋势,我们将估计结果进行可视化,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发现,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随年龄增长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这一发现初步回应了我们第一个研究问题,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也与预期基本一致。

表 2 国家认同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WVS 数据)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固定效应				
年龄	0.003	(0.004)	0.009 *	(0.004)
随机效应				
时期效应				
1995 年	0.105 ***	(0.020)	0.097 ***	(0.019)
2001 年	-0.103 ***	(0.023)	-0.115 ***	(0.023)
2007 年	-0.169 ***	(0.019)	-0.158 ***	(0.018)
2013 年	-0.024	(0.018)	-0.021	(0.018)
2018 年	0.191 ***	(0.014)	0.198 ***	(0.014)
世代效应				
1930—1934 年	0.002	(0.017)	0.001	(0.013)
1935—1939 年	-0.008	(0.017)	-0.006	(0.013)
1940—1944 年	-0.002	(0.016)	-0.002	(0.013)
1945—1949 年	-0.007	(0.016)	-0.006	(0.013)
1950—1954 年	0.008	(0.015)	0.005	(0.012)

续表 2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1955—1959 年	0.018	(0.014)	0.012	(0.012)
1960—1964 年	-0.001	(0.014)	-0.001	(0.012)
1965—1969 年	-0.004	(0.014)	-0.001	(0.012)
1970—1974 年	-0.002	(0.014)	-0.001	(0.012)
1975—1979 年	-0.003	(0.015)	-0.001	(0.012)
1980—1984 年	0.006	(0.015)	0.004	(0.012)
1985—1989 年	-0.008	(0.015)	-0.005	(0.012)
1990—1994 年	-0.010	(0.016)	-0.007	(0.013)
1995—1999 年	0.010	(0.016)	0.005	(0.013)
方差组成				
时期	0.022	(0.008)	0.022	(0.008)
世代	0.001	(0.000)	0.001	(0.000)
残差	0.452	(0.004)	0.449	(0.004)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样本数	7506		7506	

注: (1)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双尾检验)。 (2) 为节省空间, 表中未展示控制变量的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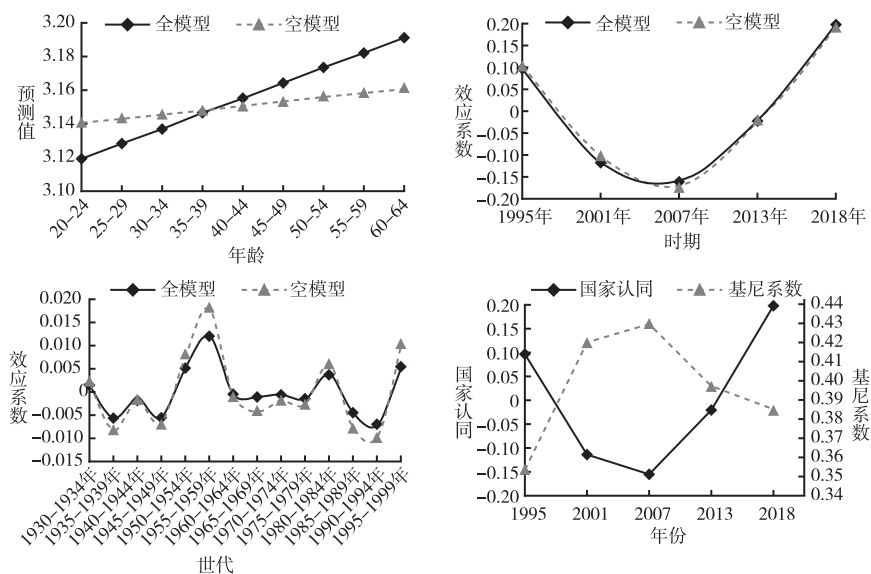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WVS 数据)

### (三) 国家认同的时期效应

如前文所述,本文对于时期效应的基本预测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可能会使国家认同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当国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国家认同可能会随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呈现上升趋势。表2和图2展示了基于WVS数据分析的国家认同时期效应结果。可以发现,随着时期的推进,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拟合曲线大致呈现“V”型,即先下降后上升。具体表现为:1995—2007年,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呈现下降趋势,2008年之后出现拐点,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这一发现初步回应了我们第二个研究问题,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也与预期基本一致。

我们进一步引入基尼系数作为测量不平等的指标,以验证社会不平等与民众国家认同之间的相关关系。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sup>①</sup>由图2可以发现,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自1992年以后,呈现逐年上升的变迁趋势,并于2008—2010年达到了峰值(0.43~0.437),之后便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我们将WVS数据中国家认同的效应系数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绘制在同一张图上(见图2)。可以发现,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状况与基尼系数呈现近乎相反的变迁趋势。这一发现验证了基尼系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也表明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可能会对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不利影响,而政府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政策对弥合社会不平等和提升民众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 (四) 国家认同的世代效应

在本文中,我们结合不同世代早期成长环境和国家政治进程以考察国家认同的世代效应。由图2可以发现,从1930年世代组(1930—1934年出生)到1975年世代组(1975—1979年出生),国家认同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全体世代的峰值在这一阶段出现。从1980年世代组(1980—1984年出生)到1995年世代组(1995—1999年出生),国家认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全体世代的最低值也在这一阶段出现。综合来看,国家认同的世代效应表现为如下特征:第一,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波动变化趋势;第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这一研究结果基本回应了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

<sup>①</sup> 参见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部分年份因数据缺失取邻近年份的值。

### (五) 稳健性检验:将 WVS 数据替换为 CSS 数据

为进一步提高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将 WVS 数据替换为 CSS 数据,同样采用 HAPC 法来估计 APC 模型,研究发现如图 3 所示。尽管 CSS 数据和 WVS 数据的时期和世代跨度不同,但在重合的跨度部分,我们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在年龄效应方面,CSS 数据结果分析显示,国家认同随年龄增长呈现上升趋势。在时期效应方面,国家认同在 2013—2021 年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这与 WVS 数据分析结果(2008 年后国家认同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大体一致。在世代效应方面,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波动变化趋势,改革开放后出生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这一发现表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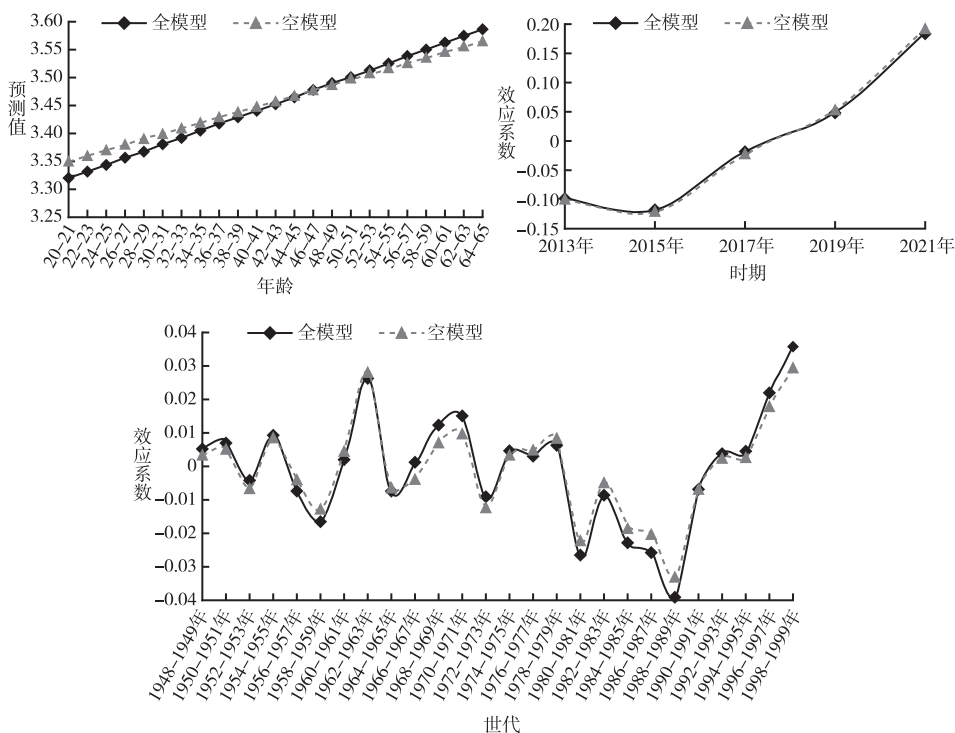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年龄—时期—世代效应 (CSS 数据)

## 五、结论和讨论

社会转型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层面的重大变迁,可能导致个体的利益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对个体的政治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国家民众政治



认同和政府信任逐年下降和逐代弱化的变迁趋势已然成为研究共识(英格尔哈特,2013),但是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趋势尚未得知。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支持度,但是随着快速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高度政治支持源自何处,具有何种新特征,需要通过系统性的科学研究作出回答。本文聚焦于国家认同的动态变迁趋势,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多期数据,从年龄、时期和世代三个维度刻画了国家认同变迁的“中国模式”,并对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作出了可能解释,对于理解中国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和政治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在年龄效应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这一发现与西方已有研究一致,即年长群体相对于年轻群体更可能产生稳定的共同体意识。国内已有研究也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世代群体的国家认同感都会增强(李春玲、刘森林,2018)。这一趋势可能与个体随着年龄增长获得更为成熟的社会认知有关。国家认同是一种集体性身份认知,个体的社会特质和社会属性会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增强趋势,最终将自我认知系统嵌入到国家成员关系中。

在时期效应方面,从1995年到2018年,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随社会不平等的变化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变迁趋势,其中1995—2007年呈下降趋势,2008—2018年呈上升趋势。在世代效应方面,改革开放前出生的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波动变化趋势,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世代的国家认同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迁趋势。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进程的重要缩影,这与中国政府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密切相关。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建立起一个以单位制、户籍制和人民公社制等组织制度为依托的“总体性社会”,民众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了高度统一和空前团结,社会生活被高度组织起来,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高度重叠,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泛而均衡的社会保障。这一时期的社会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完备,但依然为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统一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整体的不平等程度也相对较低。本研究也揭示,成长于这一阶段的群体具有相对较高的国家认同感。

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的松动和再分配体制的弱化为中国带来了经济动能的释放,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普遍提升,对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期也提升了民众的政治认同感。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机制的扩张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和

社会分化逐步加剧,不同产业和不同单位的比较收益差距也在扩大,贫富悬殊在产业、行业、地区和城乡等多个维度上呈现(李培林,2020;梁波,2018:31)。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带来了社会认同的迷失(李友梅等,2008)和社会心态的失衡(严飞,2021)。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成长于这一阶段的部分群体国家认同水平相对较低。

在经历了波谷之后,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下降趋势出现了逆转。在时期效应方面,从2008年开始,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民众的阶层认同也从2008年开始上扬,这是民生改善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反映(陈光金,2013)。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等举措(李培林,2020),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福利水平差距,以切实改善社会不平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加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社会政策的大力推进为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和国家认同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政府对民生领域提出了提高公平性、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要求,高度重视公平正义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注重共享发展理念,在发展中不断提高民生福祉水平,不断完善和优化各项社会政策(席恒等,2021;关信平,2022),在化解民生保障的不平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焦长权、董磊明,2022)。在这一时期,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与已有研究的结论(李春玲、刘森林,2018)不同,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一阶段成年的“95后”具有相对较高的国家认同。尽管缩小收入差距的道路艰难而漫长(李培林,2021),但是可以发现,这些社会保护政策对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带来了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尝试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全球化时代,培养年轻群体的爱国主义情感具有重要意义。青年是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培养和增强青年群体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迁,人们的价值观也可能随之变化。因此,如何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背景,推动青年国家认同的形成、发展和稳固,成为关乎民族赓续、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重大时代课题(杨慧青、彭国胜,2023)。第二,通过时期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分析,我们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国家认同的变迁呈现几乎相反的变迁趋势,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可能是提升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有效手段,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基本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王一鸣,2020),充分发挥社会政策体系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政府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进一步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通过完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等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实现民生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和群体间的资源均衡配置,密切关注和有效回应人民群众的民生与发展需求(席恒等,2021;关信平,2022),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提高民生福祉水平,从而创建提升国家认同感的长效机制。

本文虽然通过年龄—时期—世代效应分析方法得到了中国民众国家认同变迁趋势的一定结论,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国家认同概念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文化性国家认同”和“政治性国家认同”两种类型。本研究仅关注“政治性国家认同”及其变迁,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文化性国家认同”的内涵及其变迁趋势。第二,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本文仅将国家自豪感作为国家认同的唯一测量指标纳入考量,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国家认同的多维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应用方面进行拓展。第三,作为一种重要的身份认同类型,国家认同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收入、性别、民族和户籍等方面进行多维分析,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变迁。第四,APC模型作为一种方法目前仍然处于发展之中,本文的求解策略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许琪等,2022),研究结论可能仅适用于当前设定的APC分组。最后,本文仅从社会民生和共同富裕的视角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性国家认同变迁尝试进行了解释。国家认同变迁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过程,可能还会受到政治宣传和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的广泛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广阔的时空角度入手,更全面地探讨国家认同建构的多重逻辑。

#### 参考文献:

- 陈光金,2010,《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2013,《不仅有“相对剥夺”,还有“生存焦虑”——中国主观认同阶层分布十年变迁的实证分析(2001—2011)》,《黑龙江社会科学》第5期。
- 陈捷,2011,《中国民众政治支持的测量与分析》,安佳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 陈劲松,2009,《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福利体系的重构与社会认同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房莉杰,2019,《平等与繁荣能否共存——从福利国家变迁看社会政策的工具性作用》,《社会学研究》第5期。
-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关信平,2022,《中国共产党百年社会政策的实践与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韩震,2010,《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

- 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亨廷顿,塞缪尔,2005,《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焦长权、董磊明,2022,《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社会建设与民生支出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李斌、张贵生,2019,《农业转移人口身份认同的分化逻辑》,《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李春玲,2015,《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河北学刊》第3期。
- 李春玲、刘森林,2018,《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李大龙,2007,《“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
- ,2020,《中国疆域诠释视角: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
- 李路路,2012,《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中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明、潘春阳、苏晓馨,2010,《市场演进、职业分层与居民政治态度——一项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2期。
- 李培林,2020,《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平等与公正的变化》,《东岳论丛》第9期。
- ,2021,《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发展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 李强,2008,《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婷,2018,《哪一代人更幸福?——年龄、时期和队列分析视角下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迁》,《人口与经济》第1期。
- 李艳霞,2017,《“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当代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以代际差异为视角的比较分析》,《公共管理学报》第3期。
- 李友梅等,2008,《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李友梅、贾文娟,2018,《导论》,李友梅等著《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2007,《社会认同:一种结构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 梁波,2018,《多重制度变迁与复杂社会的回应》,李友梅等著《中国社会治理转型(1978~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梁启超,2001,《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 刘伟、肖舒婷,2023,《“民心政治”的实践与表达——兼论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拓展》,《政治学研究》第2期。
- 马得勇,2012,《国家认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外近期实证研究综述》,《世界民族》第3期。
- 马得勇、陆屹洲,2018,《国家认同及其变迁:宏观与微观的跨国比较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世界政治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孟天广、杨明,2012,《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 彭华民、齐麟,2011,《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与转型:一个制度主义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

版)》第10期。

孙立平,2002,《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战略与管理》第1期。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1994,《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王绍光,2008,《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王雅林,1994,《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社会学研究》第1期。

王一鸣,2020,《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第12期。

王卓君、何华玲,2013,《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席恒、余澍、李东方,2021,《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100年回顾》,《管理世界》第4期。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许琪、王金水、吴愈晓,2022,《理论驱动还是方法驱动?——年龄—时期—世代分析的最新进展》,《社会学研究》第6期。

严飞,2021,《分化与流动:我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心态变迁(1978—2020)》,《求索》第6期。

杨慧青、彭国胜,2023,《政府治理绩效对中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杨溯浩,2022,《民生:后发展国家构建国家认同的政治资源——中国经验与世界意义》,《南京社会科学》第7期。

姚大力,2018,《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殷冬水、范京京,2021,《“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英格尔哈特,罗纳德,2013,《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郁建兴、任杰,2021,《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政治学研究》第3期。

赵鼎新,2016,《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学术月刊》第8期。

郑秉文,2021,《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的社会保障实践》,《光明日报》6月25日。

郑功成,2017,《全面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与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郑振清、苏毓张、张佑宗,2018,《公众政治支持的社会来源及其变化——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的实证研究》,《政治学研究》第3期。

周晓虹,2008,《认同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路径》,《社会科学》第4期。

Akerlof, George A. & Rachel E. Kranton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3).

Alwin, Duane F., Ronald L. Cohen & Theodore M. Newcomb 1991, *Political Attitudes over the Life Span: The Bennington Women after Fifty Years*.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Baldwin, James Mark (ed.) 1911,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ume 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Barth, Fredrik (ed.)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Clark, April K. & Marie A. Eisenstein 2013, “Interpersonal Trust: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Revisit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2).

- Dalton, Russell & Doh Chull Shin 2014, "Growing Up Democratic: Generational Change in East Asian Democracie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5(3).
- Davidov, Eldad 2011, "N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A Longitudinal Test of Comparability in 22 Countries with the ISS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3(1).
- Easton, David 1975, "A Re-Assessment of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uppor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4).
- Elder, Glen H., Jr. 1999,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Gustavsson, Gina & Ludvig Stendahl 2020, "National Identity, a Blessing or a Curse? The Divergent Links from National Attachment, Pride, and Chauvinism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4).
- Henn, Matt & Nick Foard 2012, "Young Peopl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Britain." *Parliamentary Affairs* 65(1).
-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ddy, Leonie & Nadia Khatib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1).
- Ignatieff, Michael 1993,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London: BBC Books.
- Jasinskaja-Lahti, Inga, Karmela Liebkind & Erling Solheim 2009, "To Identify or Not To Identify?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s an Alternative Reaction to Perceiv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58(1).
- Jenkins, Richard 2008, *Social Identit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 Jones, Frank L. & Philip Smith 2001, "Diversity and Commonality in National Identitie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Cross-national Patterns." *Journal of Sociology* 37(1).
- Kunovich, Robert M. 2009,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4.
- Luo, Liying & James S. Hodges 2022, "The Age-Period-Cohort-Interaction Model for Describing and Investigating Inter-cohort Deviations and Intra-cohort Life-course Dynamic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51(3).
- Meeus, Wim, Rens van de Schoot, Loes Keijsers, Seth J. Schwartz & Susan Branje 2010, "On the Progression and Stability of Adolescent Identity Formation: A Fiv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in Early-to-Middle and Middle-to-Late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81(5).
- Meier, Armando N., Lukas Schmid & Alois Stutzer 2019, "Rain, Emotions and Voting for the Status Quo."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19.
- Neundorf, Anja & Richard G. Niemi 2014, "Beyo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Approaches to Age, Period, Cohort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33.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ollmann, Andreas 2008, "National Attachment among Berlin and London Head Teachers: The Explanatory Impact of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Pride and Supranational Attachment." *Educational Studies* 34(1).
-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6).
- Smith, Tom W. & Seokho Kim 2006, "National Prid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5/96 and 2003/0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1).
- Tajfel, Henri & John C. Turner 1986,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 In Stephen Worchel & William G. Austin (eds.),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Chiacago: Nelson-Hall.
- Tamir, Yael (Yuli) 2019, "Not So Civic: Is There a Difference Between Ethnic and Civic Nationa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 Turner, A. J. & A. Coyle 2000,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Donor Offspring? The Identity Experiences of Adults Conceived by Donor Insemin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ling and Therapy." *Human Reproduction* 15(9).
- Wright, Matthew 2011, "Diversity and the Imagined Community: Immigrant Diversity and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32(5).
- Yang, Yang & Kenneth C. Land 2013,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New Models, Method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Boca Raton: CRC Press.
- Zhao, Dingxin 2009,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3).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

责任编辑:何钧力